

藏族史学思想论纲

王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藏族 史学思想论纲



王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族史学思想论纲 / 王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04-6890-5

I. 藏… II. 王… III. 藏族—民族历史—史学—研究—中国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5034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72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我的家人和朋友

致 谢

值拙著出版之际，首先要衷心感谢导师林超民先生在学业上对我的指教和点拨。在没有项目经费的情况下，先生慨然资助我赴西南民族大学藏学系学习康方言藏语文，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同时使我对一些藏学问题的认知有了质的飞跃！云南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林文勋先生对拙著的出版鼎力相助，不仅帮我联系了出版社，还解决了出版经费，提携后进之德令人感佩！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吕昭义教授、吴晓亮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郭沂纹老师、刘志兵老师为本书出版费心不少，谨致谢忱！

书中的图表皆出自挚友姚赉博士的妙手，姚赉兄德才兼备，常为朋友解燃眉之急，对他的感激之情实难以几句话表达。同时还要特别感谢同窗王世丽教授和宗晓莲博士，她们帮我找到了《安多政教史》的两个汉译本，我对这部藏族良史的相关研究遂由空白变为现实。

我的硕士导师黄惠焜先生生前对我要求很严，恩师如果知道书稿付梓，泉下一定倍感欣慰……尤中先生、蔡家麒先生、袁家毅居士、我的大学班主任杨素华老师一直对我无私扶持。瞿林东、王文光、罗炳良、骆继光诸先生对拙著的肯定给予我

不少学术前行的动力。舅舅杨焕典先生则一再叮嘱我早日出书。还有一些师友也很关注本书的出版，恕我不能一一提到各位的名字，在此谨对您们的厚意致以深谢！

王 璞

2008 年 1 月

目 录

致谢	(1)
前言	(1)
第一章 史学思想的内涵及藏族史学思想的历史分期	(7)
第二章 藏族史学思想的滥觞期	
——7 世纪至 12 世纪	(19)
第一节 《西藏的观世音》	(19)
第二节 《拔协》	(28)
第三节 藏地上古史事考	(43)
第三章 藏族史学思想的复兴期	
——13 世纪至 14 世纪	(61)
第一节 《奈巴教法史——古谭花鬘》	(61)
第二节 《佛教史大宝藏论》	(68)
第三节 《红史》	(78)
第四节 《雅隆尊者教法史》	(89)

第五节 《西藏王统记》	(96)
第六节 《朗氏家族史》	(106)
第七节 复兴期藏族史学思想述论	(121)

第四章 藏族史学思想的发展期

——15 世纪至 17 世纪	(130)
第一节 《汉藏史集》	(130)
第二节 《青史》	(143)
第三节 《米拉日巴传》	(157)
第四节 《玛尔巴译师传》	(168)
第五节 《新红史》	(177)
第六节 《贤者喜宴》	(185)
第七节 《印度佛教史》	(193)
第八节 《后藏志》	(202)
第九节 发展期藏族史学思想述论	(210)

第五章 藏族史学思想的成熟期

——17 世纪以来	(216)
第一节 《西藏王臣记》	(216)
第二节 五世达赖撰写的三部传记	(227)
第三节 《七世达赖喇嘛传》与《章嘉国师若 必多吉传》	(240)
第四节 《颇罗鼐传》	(250)
第五节 《噶伦传》	(260)
第六节 《佛历表》	(271)
第七节 《如意宝树史》	(284)
第八节 《安多政教史》	(290)

第九节 《卫藏道场胜迹志》	(302)
第十节 《白史》	(309)
第十一节 成熟期藏族史学思想述论	(316)
第六章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320)
第七章 余论	(328)
参考文献	(334)
后记	(348)

前 言

现代藏学 (Tibetology) 的研究兴趣集中于佛教、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医学六大分支学科, 详加审视, 这些分支大都由传统藏学 (bod-kyi-shes-rig) 的五明 (lnga-rig) 发展而来。五明分为大五明 (rig-gnas-che-ba-lnga) 和小五明 (rig-gnas-chung-ba-lnga), 大五明包括修习佛教三学 (bslab-pa-gsum)^① 及二次第 (rim-pa-gnyis)^② 的内明 (nang-don-rig-pa), 演绎佛教逻辑的因明 (gtan-tshigs-rig-pa), 探讨藏文语法训诂的声明 (sgra-rig-pa), 研究医药病理的医方明 (gso-ba-rig-pa), 实践各种工艺算术的工巧明 (bzo-rig-pa)。声明又含有修辞学 (snyan-ngag)、词藻学 (mngon-brjod) 及韵律学 (sdeb-sbyor), 工巧明又衍出戏剧 (zlos-gar) 和历算 (skar-rt-sis)。大五明源自古代印度学术, 在婆罗门教即为吠陀 (Veda) 的学问, 对于佛教而言大五明就是佛学的代名词。藏传佛教也继承了大五明的知识体系, 小五明则可能是藏族人对大五明之声明和工巧明细化的结果。不难看出, 传统藏学的知识传授权基本掌握在佛教精英手中, 通观古今, 研究藏学者首先

① 笔者按: 三学即戒、定、慧。

② 笔者按: 二次第指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

必须学习的就是佛学知识，没有佛学基础，任何“高见”终归是“门外看热闹”，毕竟，藏族总体上是一个佛教民族，即使格萨尔（Ge-sar）和本教（bon）的内容，如果离开了佛学的支持，许多问题的见解仍会流于肤浅片面。

再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历史著述并未纳入藏族正统的五明学术之任何一类。古印度人缺乏治史习惯已是不争的事实，藏族人是否也受其影响呢？藏历第一绕迥火猪年（1047年），阿底峡尊者（Jo-bo A-ti-sha，982—1054年）在大昭寺（gTSug-lag-khang）的宝瓶柱下发掘出三帙书卷，一帙是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m-po）的遗训史传，一帙是大臣们所书之《如意明月》，另一帙是后妃们所写的《圣洁素绢》。^① 13世纪的掘藏书《五部遗教》（bKav-thang-sde-nga）由五个部分组成，即《神鬼遗教》（lHa-vdre-bkavi-thang-yig）、《国王遗教》（rGyal-po-bkavi-thang-yig）、《后妃遗教》（bTSun-mo-bkavi-thang-yig）、《译师与高僧遗教》（Lo-pan-bkavi-thang-yig）及《大臣遗教》（Blon-po-bkavi-thang-yig）^②。松赞干布书与《五部遗教》曾为后人增订，而这些史卷的主体内容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吐蕃王朝时期的君臣后妃和知识分子已有记录自己日常言行的习惯，记录人可能是当事者，也可能是专门的史官，14世纪的《红史》、《西藏王统记》等藏史名著就曾使用过一些今日已失传的吐蕃档案实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至迟从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起，藏文史籍就渐次出现。历史写作是吐蕃人的主位（emic）传统，与印度学术的输入无甚关系，

① 嘉木样协巴多吉：《佛历表》，《藏文史料译文集》，黄颢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92页；《西藏的观世音》，阿底峡发掘，卢亚军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② 多吉杰博整理：《五部遗教》，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

试想如果吐蕃王朝不存在历史记录的话,那么13世纪以后关于藏地上古史(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前的历史)及吐蕃王朝史的记述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正如近代藏族大学者更敦群培(dGe-vdun-chos-vphel, 1903—1951年)所言:“毫无疑问,往昔我们一定有诸王臣每年每月所作何事的详尽纪事。但是自达玛(Dar-ma)之后,民众叛乱,藏区形成分裂局面……在经历种种盛衰之际,诸王朝的史籍也都散失殆尽。”^①分裂时期吐蕃王朝史籍的大量毁佚对新生的藏族史学是一个沉重打击,不过自西藏归属中原王朝形成萨迦政权(Sa-skya, 1247—1349年)之后,藏族史学得以复苏,史书的编纂写作逐渐成为一种传统,大量史籍保存至今,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新版的《藏族史学书目》(Bod-kyi-lo-rgyus-dpe-tho)一书中,编者索朗顿珠(bSod-nams-don-grub)共著录藏文史籍2132部,这些史籍为藏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

然而,相对于国内外藏族史研究热烈兴旺的情势,藏族史学却少人问津。王尧先生在1980年第2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撰有《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一文,他以奴隶制时期、分裂时期、封建统一时期为系,把藏文历史文献分为金石铭刻、书籍卷册、文契简牍三大类,考证、论述了藏文史料的总体情况。1988年第2、3期的《史学史研究》又相应推出王尧和沈卫荣二位先生撰写的《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强调了藏文史籍与宗教的密切关系。此后,王继光和才让先生以《藏文史籍叙录》为题,在《西藏研究》上分4期(1988—1990年)介绍了一些藏文的重要史籍,包括每一部史

^① 更敦群培:《白史》,《更敦群培文集精要》,格桑曲批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籍的书名、作者、版本、成书年代、基本内容、史料价值等要素,类似的文章还有巴桑旺堆先生(Pa-sangs-dbang-vdus)的《藏族十大历史名著概述》(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同时期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也写有《藏文古代史料举要》一文(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其内容是借藏文史料对几个藏史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彭清深的《藏学重要文献史料述评》(载《藏学研究论丛》第7辑)分藏文、汉文及西文文献三部分概述了7世纪至20世纪的藏族史料。刘立千、王尧、陈庆英、黄颢诸先生在翻译藏史著作时也附带介绍过相关史乘。这些成果对拙著的写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启益。其他还有少数专论某一部藏族史书的文章,但史学理论鲜有新见。苏联佛学家安德鲁·伊万诺维奇·沃斯特里科夫(Andrew Ivanovich Vostrikov, 1902—1937年)曾著有《藏族历史文献》一书,是最早用西文研究藏族史学的作品,1962年在莫斯科出了俄文版,1970年古普塔(R. H. Gupta)的英译本在加尔各答问世后很快成为藏学经典^①。日本藏学泰斗山口瑞凤博士(Dr. Zuiho Yamaguchi)和丹麦藏学家佩尔·K. 瑟伦森博士(Dr. Per K. Sørensen)也都做过一些藏族史书的编目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此领域成绩卓著者首推美国学者丹·马丁(Dan Martin),他历经十数年搜集整理了702部藏文史籍,并于1997年以《藏史集目——藏文历史书录解题》^②为名出版。该书不仅著录了史书书名、作者、版本、主要内容、著述时间等信息,且有其他语种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极便学者。不过

① Simon Wickham-Smith (ed.), *Andrew Ivanovich Vostrikov*, from http://www.orientalstudies.ru/tibetology/persE/vostrikov_e.html, 2005.

② Dan Martin, *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7.

书中目录只收唯一作者的作品，多位作者撰著的同一史书及大量传记未予考虑^①。除以上代表性成果外，西方藏学界对藏文史籍的研究多见诸译著及论文，对此我会在相应的地方加以介绍。

在国内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大概只有《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载《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是在实质意义上“摸索”藏族史学史的一些问题，就史学理论而言，此文在概念、分类、术语等方面的表述尚需斟酌。近闻孙林教授有《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一书问世，惜至今未能觅获。造成藏族史学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是一些学者认为藏族史籍与汉文史籍相比显得数量少，篇幅小，无研究价值；二是不少学者觉得藏族史书载录内容多为本教和佛教徒编造的传说神话，不可信。第一类意见显然是汉文史学中心观的臆断。第二种看法是令各国、各族藏学学者颇感头疼和尴尬的问题，不信其史过于武断，相信其史又不知如何抉择。这两种观点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客观看待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问题，拙著的研究目的之一便是与此类观点商榷。

硕士期间，在黄惠焜先生指导下我赴滇西北藏区做了4个月的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毕业论文《雪域心语——现代化过程中滇西北藏族的人观表述》，探讨的内容是藏人的观念和情感。是文认为，当今藏学研究的视角应当尝试由客位（etic）换为主位，外视转向内视。视角的转换对我后来的研

^① Kurtis Schaeffer & Jann Ronis, *Key Tibetan Historical Works: Introductions and Summaries of Contents* (November 9, 2004), from <http://iris.lib.virginia.edu/tibet/xml/showEssay.php?xml=/collections/history/summaries.xml&l=d1e207>.

究助益良多，经过三年的细致思考且辅以 20 万字的藏族史书读后感，我决定以藏族史学思想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这篇博士论文即为拙著的雏形。藏族史学思想研究是中国史学史及史学理论建构的必要过程，导师林超民先生对此一言中的地指出，传统的中国史学史只写汉文史学，但中国史学本应包括藏族史学和其他少数民族史学！我希望通过拙著的写作能使同仁对藏族史学思想及民族史学有一些更为客观的认知，而作为立论的基础，我将在第一章对史学思想的内涵予以界定。

第一章 史学思想的内涵及藏族 史学思想的历史分期

在国内外史学理论的著作及论文中，“史学思想”（historical thought）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或许是孤陋寡闻，就笔者所接触的资料来说，尚无人对“史学思想”的内涵或范围作过明确论述，关于某位史家或某一时期史学思想的研究亦难免失范。开宗明义是历史学亦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任何未经讨论和界定的术语或范畴皆无益于历史学的建构，下面笔者拟就史学思想的内涵谈谈自己的看法。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领国史凡三十年，时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知几答：“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①清人章学诚（1738—1801年）也强调：“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列传第五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据武英殿本1986年影印版，第469页。

职是故也。”他进而论道：“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同时，章学诚特别提到史德即治史心术的重要性：“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①刘知几没有具体解释才、学、识的内涵，从其所作的比喻并结合章学诚的论断来看，史才是史家运用文字的能力，史学是史家对史事的稔熟，史识则是史家对史料的认知。刘知几说的史才，基本相当于章学诚谈到的史才与史识之和，刘子玄注重史才和史学的统一，而章实斋的论断已触及才、学、识三长之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刘知几所言“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的求真信念与章学诚“史德”表达的含义又可互为补充。史德的明确提出也使史家“三长”发展为“四长”，梁启超先生（1873—1929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就具体讨论了史家四长。首先，史德不容易养成，一些研究者常犯的毛病便是对史实夸大、附会或武断，反之就像章学诚所说，有史识者必知史德。对于史学，梁启超主要谈如何治史，如何处理知识之专与博的关系，其根本是史科学的素养。梁任公眼中的史识是历史家的观察力——“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观察的程序又分为由全部到局部以及由局部到全部两种。史识讲求的是独特的思维力和判断力，因此历史研究不能为传统思想及自我成见所蔽。这样的史识观已涉及方法论的问题。梁氏所说的史才是指作史的文字技术，分组织和文采两大要素：组织即史

^①（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章氏遗书》卷第五，萧山王宗炎编次，吴兴刘承幹校订，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